

全球参与者、身份困境与全球性大国

——评《中国走向全球：羽翼未丰的大国》

许少民

2013年,美国中国问题研究专家沈大伟(David Shambaugh)的新著《中国走向全球:羽翼未丰的大国》出版。^① 沈大伟现为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教授、中国政策研究项目主任、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研究项目高级研究员。主要从事当代中国政治、军事、安全和外交议题的研究,同时研究亚洲国际关系,并对欧盟和美欧关系有浓厚的研究兴趣。沈大伟出版和主编著作多部,代表性编著如《纠缠的大国:美国和中国》、《图解中国未来:国内与国际挑战》等。^② 在《中国走向全球:羽翼未丰的大国》一书中,沈大伟指出,尽管目前论述中国崛起的著作汗牛充栋,但这些著作要么过于专业,要么过于琐细。前者让普通大众望而生畏,因此受众有限,主要局限于学术圈。后者也许通俗易懂,但往往见树不见林,容易产生误解,亦即读者往往会认为他们所论述的“中国”就代表了“真实的中国”,然而事实未必如此:局部之和并不代表着整体。沈大伟这本书既严谨客观,又通俗易懂,详细描绘了中国在世界各地的“足迹”,有助于西方读者从“全球”而非“地区”的视角来看待中国的影响力。该书的核心观点令人深省。沈大伟认为,虽然中国几乎将触角延伸到世界每个角落,中国俨然是一个“全球参与者”,但中国并非名副其实的“全球性大国”。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仍旧有限,仍然不能与美国

* 许少民:澳大利亚莫道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亚洲研究中心博士候选人。

** 感谢《国际政治研究》匿名评审专家对本文提出的宝贵修改建议。

①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② David Shambaugh, ed., *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12; David Shambaugh, ed., *Charting China's Future: Domestic & International Challenges*, Routledge, 2011.

并驾齐驱。^① 该书分为八章。沈大伟重点探讨中国的全球身份、中国的全球外交、中国在全球治理中扮演的角色,并具体分析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军事实力和文化软实力,最后阐述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崛起的中国。该书主要根据内容分析法,充分利用各种文献,同时采用大量一手访谈资料。对当代中国外交感兴趣的西方读者而言,本书不可或缺。

一、“羽翼未丰的大国”及其具体表现

沈大伟首先沿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在《权力的未来》一书中对“权力”的定义。^② 所谓“大国”(great power),是指一国能够影响某些国家或某项议题,以至于能够塑造自己想要的结果。在这个意义上,大国的真正内涵并不在于它拥有多少资源或财富,而取决于它如何有效地将这些资源转化为真正的影响力。他认为,中国在某些方面是一个全球性大国,诸如在全球贸易模式、国际能源和商品贸易、国际旅游业、奢侈品消费、全球房地产市场交易等有限领域,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有目共睹。然而除此之外,沈大伟认为中国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力不尽如人意,因此称之为“羽翼未丰的大国”。^③

沈大伟认为,中国政学两界对“权力”或“实力”的理解系统且全面。^④ “综合国力”这一术语的流行便是明证。它不仅包括军事和经济实力,也包括文化软实力。各种实力之间相互联系,互为一体。沈大伟依次从以下方面分析中国的全球影响力。

第一,中国在全球经济领域的影响力与日俱增。无疑,中国已是一个众所周知的“贸易超级大国”和“世界工厂”。在发展国际贸易的速度和规模上,哪怕是曾经辉煌一时的美国和日本也不能和中国相比,这主要归功于自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届政府都将促进贸易作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一个关键支柱。然而,他同时指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不正常的贸易结构的制约。中国高技术产业的发展依然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中国依然需要从发达国家进口高精尖产品。这种贸易结构的不均衡也体现在中国日益依赖原材料和能源进口方面。

沈大伟指出,中国对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大量需求深刻影响了全球能源市场的发展趋势,中国的经济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中国政府鼓励国有大型能源公司

①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p. 10; 类似观点参见 Andrew S. Erickson and Adam P. Liff, “A Player, but No Superpower,” *Foreign Policy*, 7 March, 2013,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3/07/a_player_but_no_superpower_china_military.

②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2011, p. 8.

③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pp. 7—8.

④ Ibid., pp. 5—6.

进入国际市场,以缓解市场价格波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同时扩大中国在这一领域的话语权。然而,除此之外,他认为,在“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这两个核心层面,尽管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扩大影响力,但与其他大国相比还是相形见绌。简言之,沈大伟指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日益扩大,但并非无远弗届。^①

第二,中国软实力依旧“弱不禁风”。通过对众多中国专家、学者及官员进行访谈后,沈大伟指出,政治和学术精英一致同意中国需要发展软实力,这是因为他们普遍认识到中国存在“软实力赤字”(soft power deficit)。他认为,中国软实力的匮乏与中国政府的宣传政策有关。^②

与奈的看法一致,沈大伟也认为软实力并非来自政府的行动和政策,而源于自由开放及富有活力的社会。他对“软实力”与“公共外交”进行了区分。软实力来自一个社会的吸引力,而公共外交则是政府试图影响舆论的一个重要手段。他指出,在中国的语境下,“软实力”“公共外交”及“对外宣传”有时被混为一谈。^③

在这个背景下,尽管中国政府高度关注中国的国际形象,一些部门——例如国新办、外交部新闻司和公共外交办公室、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人民日报》、汉办等——先后投入大量资源推动公共外交,但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依然步履维艰。^④ 沈大伟承认,在旅游、教育、体育、艺术品拍卖和交流、文学和电影,以及时尚和设计等方面,中国的文化触角在不断对外延伸,但总体而言,中国的文化软实力影响依然有限。归根结底,中国政府是在“购买”而不是“建设”软实力。^⑤ 因此,尽管中国政府坚持不懈地塑造积极正面的国际形象,但他认为中国的软实力建设任重道远。^⑥

第三,在安全领域,中国的全球影响力“非常有限”。甚至在沈大伟看来,尽管中国意欲成为一个全球大国,但它在安全领域的有限影响力给中国带来非常严峻的挑战(如果不是最严峻的话)。这是因为,与中国在其他领域的影响力相比,中国的军事影响力显得更为薄弱。与此同时,中国“不干涉内政”及“不建立海外军

①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pp. 156—206.

② 类似观点参见 Zhang Xiaoling, “China’s International Broadcasting: A Case Study of CCTV International,” in Wang Jian ed., *Soft Power in China: Public Diplomacy through Communica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pp. 68—69; Ingrid d’Hooze, “Public Diplomacy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Jan Melissen, ed., *The New Public Diplomacy: Soft Pow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 89; Yee-Kuang Heng, “Mirror, Mirror on the Wall, Who Is the Softest of Them All? Evaluating Japanese and Chinese Strategies in the ‘Soft’ Power Competition Er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Vol. 10, No. 2, 2010, p. 299; Chin-hao Huang, “China’s Soft Power in East Asia: A Quest for Status and Influence?,” NBR Special Report, January 2013, pp. 10, 18.

③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pp. 209—212.

④ Ibid., p. 268.

⑤ Ibid., p. 255.

⑥ Ibid., p. 268.

事基地”的对外承诺显然制约了中国在安全领域的影响力。^①

沈大伟认为,中国的安全领域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军事现代化建设。过去30年来,中国持之以恒地全方位推动陆军、海军、空军和第二炮兵的军事现代化建设。因此,军费开支节节攀升,武器不断更新换代,军事韬略与时俱进,中国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成是世界第二号军事大国。尽管如此,中国目前还是把军事力量部署在本土和近海,以及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因此中国的军事影响力并未覆盖全球。^②

沈大伟随后探讨了中国在安全领域所面临的困境。他认为,一方面,如果中国继续崛起,中国需要在全球安全领域中扮演与其地位相称的角色,那么这势必要求中国政府增强在安全领域的影响力;另一方面,中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影响力也必然会让周边国家及国际社会忧心忡忡。以此观之,中国在全球安全领域的积极行动将是一把“双刃剑”。如果中国政府的行动与西方国家的初衷一致,或者说是联合国及其他广受认可的国际组织的授权之下积极参与行动,那么,中国在全球安全领域所起的作用将获得认可。如果北京保持不作为的姿态,外界会批评北京“搭便车”和“不负责任”。这就是北京所面临的真实困境。^③

在沈大伟看来,这个困境很大程度源于中国对国家利益的特殊界定。具体来说,中国主要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以及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对于是否在国际安全领域扮演更积极的角色,中国政府往往犹豫不决。^④这种若即若离的矛盾情结也体现在其对全球治理的态度之中。^⑤尽管中国政府不断积极地介入全球治理,并且努力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但它始终对西方自由主义理念指导下的全球治理模式怀有疑虑,因而对西方的“中国责任论”保持清醒的警惕。反过来,西方国家也对中国政府在全球治理当中扮演的角色既爱又恨。^⑥沈大伟认为,中国身处国际体系“之内”但又令人吊诡地游离在这个体系“之外”。^⑦

概言之,沈大伟认为,尽管中国在经济、文化、安全及全球治理方面的影响力不断提升,而且可以预期这种影响力会不断扩展,但中国的影响力依然有限,中国仍旧不能与美国并驾齐驱。

①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pp. 269—271.

② 类似观点参见 Adam P. Liff and Andrew S. Erickson, “Demystifying China’s Defence Spending: Less Mysterious in the Aggregate,” *The China Quarterly*, March 2013, pp. 20—22.

③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pp. 269—306.

④ Ibid., p. 306.

⑤ Ibid., pp. 121—155.

⑥ Ibid., p. 127.

⑦ Ibid., p. 7.

二、战略争论、身份困境和国际社会的应对之策

那么,为何中国还不是一个全球性大国?造成这一结果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沈大伟认为,问题在于中国政治和学术精英对中国的角色和战略定位没有形成共识,中国的国际身份依然游离不定,中国仍旧面临“身份困境”。^①北京大学王缉思教授亦曾指出,中国政治与学术精英之间截然不同的看法与立场无法为中国政府的大战略规划奠定一个政治共识。^②

沈大伟认为,关于中国的角色及其战略定位,中国目前主要有七种派别。从左到右分别是本土主义者(The Nativists)、现实主义派(The Realists)、大国政治派(The Major Powers School)、亚洲第一派(Asia First)、全球南方派(The Global South School)、有选择性的多边主义者(Selective Multilateralists),以及全球主义派(The Globalists)。^③

简言之,这七个派别的争论反映出崛起的中国正面临严峻的身份认同问题。诚然,作为一个崛起的大国,中国并非不能拥有多种身份,而且中国政府也的确针对不同对象展现不同角色。^④然而,这些角色往往相互冲突,这使得中国外交面临张力、充满矛盾。这也是为何沈大伟认为连续性和一致性“并非”中国外交政策的显著特征。^⑤沈大指出,中国政府目前的外交重心依然落在这个光谱的左端,而非右端。现实主义派依然占据主导地位,但它受到本土主义者的强烈拉扯,而来自大国外交派和全球南方派的拉力则小得多。沈大伟进一步指出,近年来,中国外交之所以表现得“盛气凌人”,部分原因在于中国外交依然由现实主义主导,而且来自左派的压力不断增加所致。^⑥

既然中国是一个羽翼未丰的大国,而且中国的国际身份还未最终确定,国际社会应该如何应对正在崛起的中国?在沈大伟看来,中国已是这个国际体系的一部

① 类似观点参见 W. A. Callahan, “Conclusion: World Harmony or Harmonize the World?,” in W. A. Callahan and Elena Barabantseva eds., *China Orders the World: Normative Soft Power and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 C.: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11, pp. 249—269; Qin Yaqing, “The Possibility and Inevitability of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W. A. Callahan and Elena Barabantseva eds., *China Orders the World: Normative Soft Power and Foreign Policy*, pp. 48—49; Ding Sheng, “Analyzing Rising Power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oft Power: A New Look at China’s Rise to the Status Quo Power,”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 Vol. 10, No. 64, March 2010, p. 256; Franklin L. Lavin, “Four Issues Facing China,” Lecture for the Heritage Foundation, 1st April 2013, <http://www.heritage.org/events/2013/01/issues-facing-china>, 2013-07-20。

② Wang Jisi, “China’s Search for A Grand Strategy,” *Foreign Affairs*, Vol. 90, No. 2, 2011, p. 71.

③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pp. 13—44.

④ Shaun Breslin, “China and the Global Order: Signalling Threat or Friendship?”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89, No. 3, 2013, p. 633.

⑤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pp. 52—53.

⑥ Ibid., p. 43.

分,尽管中国并非完全接受或服从这个体系,但“部分接受”至少比“不接受”要好得多。他指出,目前,西方应对中国的大战略需要做出一定的调整,即如何在“规范”层面上将中国融合到这个国际体系之中。这意味着国际社会(主要是欧美、联合国、亚洲发展银行等)需要在市民社会、媒体、法制、政治透明度和全球治理等方面上加强对中国社会和个人的交流与培训。

沈大伟坚持认为,融合战略(integrationist strategy)虽然需要调整,但基本上仍然是应对中国崛起的核心战略。他强烈反对遏制战略。在他看来,那些旨在对中国进行先发遏制(preemptive containment)的政策不仅愚蠢而且危险,因为这个战略不仅脱离实际,而且中国也不可能被遏制。^①

三、贡献与不足

本书的贡献,除开篇所述外,笔者认为,沈大伟的另外一个贡献在于他相对比较清晰地阐明他所指代的“中国”。诚然,“中国”只是一个方便的符号,即形成中国内政外交的一系列复杂过程和影响因素的简称。^②因此,有关“中国”内政外交的著作显然需要尽可能地理清这些复杂的行为体、互动过程和影响因素。否则,抽象谈论“中国”无法让读者更加深入地理解这个复杂的国度。

在本书中,沈大伟基本上厘清了他笔下的“中国”。他着重探讨当前中国在经济、安全、文化领域的影响力,以及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在分析某一具体问题时,沈大伟基本上也能对“中国”这个符号所代表的复杂过程和影响因素做出说明。因此,对于如何提升中国的软实力,沈大伟的观点与奈的看法如出一辙:让中国社会的聪明才智自由发挥。^③此外,沈大伟对中国国内有关“中国”角色定位的不同看法的梳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中国政治和学术精英在这个问题上还未达成共识。这种身份焦虑与矛盾情结影响了中国政府的外交决策。这也是为何他认为中国政府往往容易倾向于“反对”(what it is against)而非“认同”(what it is for)什么。^④最后,沈大伟也用很大篇幅勾勒出中国政府外交决策过程中的不同参与者及其角色差异,并据此提出了国际社会应该如何接触并影响这些行为体,使之最终能够影响中国政府的对外政策。^⑤

诚然,本书也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

①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pp. 307—317.

② Mark Beeson, “Can China Lead?”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4, No. 2, 2013, p. 246.

③ Joseph S. Nye, “What China and Russia Don’t Get About Soft Power,” *Foreign Policy*, 29 April, 2013,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3/04/29/what_china_and_russia_don_t_get_about_soft_power? page = 0,0, 2013-07-19.

④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p. 153.

⑤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pp. 61—72.

第一,沈大伟对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总体判断仍需进一步推敲。或许是因为他预设中国并非全球性大国,即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总体有限,所以在分析中国的经济影响力时,他似乎有意纠正学界对中国崛起论的肯定。经济崛起是中国崛起的基础,这已是共识。关键问题在于如何判断中国经济是否“真正”崛起。尽管沈大伟赞同中国经济在诸如贸易和能源需求等方面对全球经济的巨大影响,但他深信“对外投资”和“对外援助”是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核心要素。他认为,这两个软肋就决定了当下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并非如主流观点所阐述得那样突出。

笔者认为,“对外投资”与“对外援助”固然重要,但并非衡量中国经济影响力的核心指标。这是因为:投资是一种双向互动的行为,它一方面赋予投资者影响力,但另一方面被投资方也拥有不容置疑的影响力。因此,笼统地根据投资金额来判断投资方的影响力显然不太客观。这种影响力的程度应该根据具体案例具体分析。其次,中国是后发国家,对外投资的历史毕竟很短,不能与其他老牌发达国家悠久的对外投资历程相提并论,因此中国对外投资额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本来就很正常。^①因此,我们无法单纯根据投资的“规模”断定中国的经济影响力。进一步说,只要考虑到这些投资大部分是在过去十年完成的,那么,从这种对外投资的增长“速度”来看,中国的对外投资表现得更加抢眼。

再者,很多个案表明,中国并非不愿意对外投资,而是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社会本来就对中国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投资怀有偏见与猜疑,这严重限制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步伐。^②沈大伟也意识到这个问题,并认为这是中国崛起过程中必然面临的挑战,^③但是换一个角度来看,西方国家对来自中国企业大型投资的担忧恰恰说明中国对外投资已经引起他们的高度关注。这种过度反应不正表明中国的经济甚至政治影响力已经深入人心么?笔者认为,统计数据能够反映出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但经济影响力并不完全表现在这些数据之中,它也通过人们的心理反应表现出来。沈大伟意识到中国经济的现实影响力有限,却忽略了它给人们带来的巨大心理影响。^④最后,对外援助可看成是一种经济行为,但它同时也是一种政

① Daniel Rosen and Thilo Hanemann, “China’s Changing Outbou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Profile: Drivers and Policy Implications,” Peterse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Policy Brief PB09-14, WashingtonDC, 2009, p. 3.

② 西方国家的政府和社会对来自中国大型国有企业的投资往往不太放心,原因在于,他们普遍认为,这些企业与中国政府之间存在紧密联系,它们不是独立自主的商业行为体。这最终影响了中国企业在西方国家的投资步伐。参见 Jeffrey D. Wilson, “Resource Nationalism or Resource Liberalism? Explaining Australia’s Approach to Chinese Investment in Its Minerals Sector,”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 65, No. 3, 2011, pp. 283—304.

③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pp. 199—202.

④ 迈克尔·巴尔(Michael Barr)指出,中国崛起并不单纯是一个经济事件。它的影响也体现在人们对中国崛起的心理反应,即这种恐惧如何影响西方人的身份认同。Michael Barr, *Who Is Afraid of China? The Challenge of Chinese Soft Power*,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11, pp. 3—4.

治行为。在某些国家和地区,中国的对外援助可能更多是一种经济影响力,但在另外一些地方,它却是一种政治影响力。^①在这个意义上,沈大伟将它看成是衡量中国经济影响力的重要指标似乎不太准确。

第二,沈大伟对中国文化软实力的剖析也存在一些不足。他并没有有效区分“软(硬)实力”与“软(硬)资源”。软实力是一种吸引力,它不需要依赖“大棒”和“胡萝卜”(硬实力),它是一种能让他人去做你想让他做的事情的能力。^②“软资源”指的是构成软实力的“无形资产”,它包括文化、意识形态、规范和价值观等。^③与之相应,“硬资源”包括军事武器、科学技术、经济杠杆、金融资本、人力资源等。“巧实力”严格来说并不是一种实力,而是一种如何有效运用软硬资源和实力的灵活战略。^④

一般而言,软资源是一国软实力的主要来源,但硬资源同样能够成为软实力的来源。^⑤例如,对外援助所依赖的资金、技术、人力资源如果运用得当,它自然可以看成是一国软实力的象征。一些北欧国家的对外援助便是典范。军事力量如果用于联合国维和行动,它显然有利于促进一国的软实力。^⑥反过来,软资源也一样能够成为一国硬实力的主要媒介。“文化帝国主义”便是其中一例。“对外宣传”和“公共外交”的根本差异也在此:软(硬)资源究竟是用于制造硬实力还是培育软实力?^⑦总之,正如奈所言,“从行为角度来看,软实力就是吸引力。从资源角度来看,构成软实力的资源就是能够产生这种吸引力的有形和无形资产”。^⑧

笔者认为,沈大伟误将一些中国软资源(历史、文化、文学、艺术、时装、电影等)看成是中国的软实力。与此同时,沈大伟忽略了一些硬资源其实可以构成中国软实力的重要来源。不可否认,由于“中国特色”的因素,中国以外的受众难以

① Deborah Brautigam, *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 China in Afric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Marc Lanteigne, "Water Dragon? China, Power Shifts and Soft Balancing in the South Pacific," *Political Science*, Vol. 64, No. 1, 2012, pp. 21—38; Jaewoo Choo, "Mirroring North Korea's Growing Economic Dependence on China: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Asian Survey*, Vol. 48, No. 2, 2008, pp. 343—372.

② Joseph S. Nye, *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 New York: Public Affairs Publishing, 2004, p. x.

③ Craig Hayden, *The Rhetoric of Soft Power: Public Diplomacy in Global Contexts*, U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2, p. 5.

④ Geraldo Zahran and Leonardo Ramos, "From Hegemony to Soft Power," in Inderjeet Parmar and Michael Cox, eds., *Soft Power and U. S. Foreign Polic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25; Joseph S. Nye, "Security and Smart Power,"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Vol. 51, No. 9, 2008, p. 1353;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p. xiv.

⑤ Joseph S. Nye, *The Future of Power*, pp. 21, 48, 52, 226.

⑥ Shogo Suzuki, "Chinese Soft Power, Insecurity Studies, Myopia and Fantasy," *Third World Quarterly*, Vol. 30, No. 4, 2009, pp. 783—785.

⑦ Joseph S. Nye, "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Vol. 616, March 2008, p. 101.

⑧ Joseph S. Nye, *The Power to Lea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31.

理解中国的软资源,^①因此,这些资源对中国软实力的贡献可能有限,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软实力非常薄弱。对中国软实力的评估不仅需要考虑软资源的作用,也要认识到硬资源的重要性。沈大伟似乎对中国政府“购买”软实力的做法不以为然,但他没有意识到,这种硬资源(经济资源和人力资源)在建设中国软实力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孔子学院的运作便是其中一例。

第三,沈大伟的论述当中也流露出“西方中心论”的情结。例如,在分析中国与全球治理的关系时,他指出,大多数中国政治和学术精英执着于狭隘自私的国家利益观,对全球治理的观念和运作充满疑虑。反过来,西方对中国在全球治理中起的作用又爱又恨。这意味着,如果中国不能起积极的作用,那么中国自然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在最后一章,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作为一个“孤独的大国”,“中国没有任何盟友,与世界上很多国家(地区)保持一种互不信任的紧张关系”。他说中国是一个怀有“不满、沮丧、委屈和怨怼”的国家。“对那些往昔待它不公,以及如今与它不和的国家,它都会以牙还牙”。^②笔者认为,这些判断背后其实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傲慢心态,弦外之音是,中国是一个“非正常”国家。非正常国家自然不可能成为全球性大国。因此,国际社会(西方国家)的主要责任是将中国转变为一个“正常”国家,让它彻底融入这个体系之中。

巴里·布赞(Barry Buzan)指出,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一个双向的过程。一方面,崛起的中国需要对国际社会的基本架构和规则做出妥协;另一方面,其他大国同时也应该对这个框架和规则的某些变化做出妥协,以满足中国的某些诉求。^③这是一个相互妥协的过程。然而,正如一些学者指出,当前美国学界和政界谈论更多的是要求中国“分担责任”(burden sharing),而不是与中国“分享权力”(power sharing)。^④沈大伟的著作也有这个倾向。他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果中国要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那中国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什么?至于国际社会,特别是现存体系的主导者(美国等西方国家),是否需要给中国更多的空间,他几乎不置一词。

总之,本书不仅全面,而且相对比较客观,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西方读者了解中国内政外交的复杂性。他的核心观点——中国是个“全球参与者”而非“全球性大国”——有助于读者更加深入地思考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并反思“中国崛起论”。

① David Shambaugh, *China Goes Global: The Partial Power*, pp. 212, 218.

② Ibid., pp. 310—311.

③ Barry Buzan, “China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Is ‘Peaceful Rise’ Possible?”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 3, 2010, p. 5.

④ Gregory Chin and Ramesh Thakur, “Will China Change the Rules of Global Order?”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Vol. 33, No. 4, 2010, p. 134.